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9906001

UDC_____

学 位 论 文

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的相关性分析

喻 振 晖

指导教师姓名: 陈 振 明 教 授

申请学位级别: 硕 士

专 业 名 称: 政 治 学 理 论

论文提交时间: 2 0 0 2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 0 0 2 年 月

学位授予单位: 厦 门 大 学

学位授予日期: 2 0 0 2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评 阅 人_____

2002 年 5 月

内 容 摘 要

关于体制转型和腐败滋长这两个单独的政治现象，国内外学者已经做出了许多的论述；但关于这二者的相关性分析，还并没有很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研究和比较置身于体制转型条件下腐败滋长的新类型和新特点，通过对中国、韩国和俄罗斯在体制转型时期腐败现象的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从理论层面上揭示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之间的相关性，并以这种相关性为基础，提出对处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和建议。

正文共分三个部分：

一、“腐败”与“体制转型”的概念。通过综合评析国内外学者关于腐败概念与体制转型概念的论述，提出本文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为本文的论证提供理论基础。

二、中国、韩国、俄罗斯体制转型时期腐败现象的实证分析。在这一部分，选择中国、韩国、俄罗斯三个国家在体制转型时期腐败的滋长现象作为案例，具体分析这三个国家的腐败现象及其程度在体制转型背景下的特点和演变趋势，并解释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三、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相关性的理论分析。通过对中、韩、俄三国在体制转型时期腐败程度的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从理论层面上抽象出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之间相关性的一般结论。

结束语。从本文上述的分析进一步引申出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廉政建设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体制转型 腐败滋长 相关性 分析

目 录

序 言	1
一、“腐败”与“体制转型”的概念	2
1. 关于腐败的概念	2
2. 关于体制转型的概念	5
3. 本文对腐败和体制转型的定义	6
二、中国、韩国、俄罗斯体制转型时期腐败现象的实证分析	8
（一）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的腐败滋长现象	8
（二）韩国体制转型时期的腐败滋长现象	16
（三）俄罗斯体制转型时期的腐败滋长现象	18
三、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21
结束语：启示和建议	29
参考文献	33
后 记	36

序 言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自从国家和商品产生以后，它就一直成为纠缠人类社会的一大问题。只要国家存在，就意味着公共权力直接掌握在部分人手中，这些人就有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可能；只要商品交换存在和发展，就会滋生出腐蚀权力、诱发腐败的因素。恩格斯在考察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曾指出：在原始公社解体和国家产生的过程中，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和最初的发展，掌握公共权力、从而掌握交换权力的氏族首领，就逐渐地把某些交换来的物品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这就是最早的腐败。综观整个人类文明史，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环顾当今世界，没有一国能够幸免于腐败现象的困扰。在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的快车道时，世界各国相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腐败运动的浪潮。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在不同国度、不同体制和不同时期，腐败的滋长现象是大不相同的：有些国家的腐败程度浅，而有些国家的腐败程度深；在有的国家里，腐败滋长已经得到基本控制，而在另一些国家里，腐败滋长却愈演愈烈，甚至泛滥成灾，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体制转型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事件，也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体制转型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替代另一种管理方式，一种调节机制替代另一种调节机制，它本身还蕴含着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在置身于新旧体制转型的国家里，腐败现象的滋长更是体现出与以往时期所不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本文将对中国、韩国、俄罗斯三国在体制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从理论层面上揭示出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之间的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引申出对正处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转型中的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和建议。

一、“腐败”与“体制转型”的概念

研究一个课题首先需要正本清源，即明确该课题所包含的基本范畴的定义。本文要探讨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之间的相关性，就必须首先考察中外学者关于“腐败”与“体制转型”这两个基本范畴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

1. 关于腐败的概念

西方学者普遍倾向于使用一种相对广义的腐败定义方式。例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尼（Joseph S. Nye）对腐败的定义在西方政治学文献中颇具代表性：“腐败是为了谋取私人方面（家庭或个人小集团）、金钱或地位的利益而违背公共职责要求的行为，以及其它种种违反关于禁止私人条款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贿赂、裙带关系和挪用公共资源。”^①

阿诺德·罗格（Arnold Rogow）和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腐败行为违背了对公共或市民秩序体系的责任感，事实上，它与该体系是无法相容（而且还有破坏作用）。一种公共或市民的秩序应使公共利益高于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而违背了公共利益就是腐败行为。”^②

彼得·德烈昂（Peter DeLeon）：“腐败是一种综合的形式，即为了获取某种有意义的个人所得，而产生的不加约束的、通常是值得谴责的政策影响力，在这里，这种个人所得，可以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心理上的报酬。”^③

朱丽叶·孔（Julia Kwong）认为，“特定的腐败行为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本质却是始终不变的——即通过出卖公共职位上的权力以换取私人所得。在职者通过滥用权力和各种公共资源违背了法律和工作职责，他们钻营公私财产以及利用各种被请求的机会来索取私人所得。”^④ 这里的“私人所得”与彼得·德烈昂（Peter DeLeon）所说的“有意义的个人所得”是大同小异的，都是指一种广义的私人报酬。

阿米泰·艾特齐耶尼（Amitai Etzioni）认为：“腐败是从一种正确的状态向不正确状态的转变。……我所谈到的不正确状态是为了私人利益而对公共职务的使用。”^⑤ 这里，他所用的限定词是“不正确的”，而非“违法”的。这个定义隐含着，并不是所有的腐败行为都是违法的，在现实中也可能存在着不违法但却是腐败的行为。

维托·唐齐（Vito Tanzi）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体现为现金贿赂。”^⑥ 他甚至觉得，

① Joseph S. Nye,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1967). p.419.

② Arnold A. Rogow and Harold D. Lasswell, *Corruption, Power, and Rectitud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3. Directly from Peter DeLeon,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Corrup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 Inc., 1993. p.24.

③ Peter DeLeon,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Corrup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 Inc., 1993. p.25

④ Julia K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ruption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7, p.25.

⑤ Amitai Etzioni, *Capital Corruption: The New Attack on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4. p.4.

⑥ Vito Tanzi, "Corrup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Policies, Institutions and The Dark Side of Economics*, chapter 7.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0. p.111.

一位公共职员为了出去度假而谎称生病的行为，也是滥用公共职权而谋取私人所得的腐败行为。在他看来，只要一项行为满足“滥用公共权力”和“谋取私人所得”这两个条件，就可以被称为腐败行为，而不管这项行为是否包含现金交易。从唐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认为的“私人所得”，远远超过物质和金钱利益的层面。

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还有塞缪尔·P·亨廷顿关于腐败的定义：“腐化（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①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普遍倾向于从一个相对广义的角度来定义腐败的概念。这些文献在界定腐败行为时基本认同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任何腐败行为都必须涉及到公共权力的使用。如果一项行为没有包括这一点，则其不能被称为腐败行为。(2)腐败行为的后果一定要产生某些形式的私人收益，这种收益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方面的。(3)虽然大多数的腐败行为是违反法律的，但并不能说任何一项腐败行为都是如此，因为收到好处的官员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寻求法律的空子以保护自己。

中国学者们对腐败概念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的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论点。

第一种论点是把腐败特指为公务人员滥用职权，违反法律、法规、纪律乃至道德准则，谋取私利并对社会利益造成危害的行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强调腐败的“以权谋私”性，而且突出它的违法性，例如我国学者杨继亮^②、杨春洗^③、祝福恩、于丽^④等人关于腐败概念的定义。这种观点的本质特征就是认为腐败是一种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是法律、法规和各種规定所明确禁止的，否则就不能算作腐败行为。

第二种论点是我们较常听说的“寻租理论”观点，即从经济学的供求和交换关系的角度来给腐败下定义。这类定义将官员视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当官员把公共权力或公共职位视为一种可出卖的资源，并通过市场交换以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时，就会发生腐败。

吴敬琏是我国最早引进并介绍“寻租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指出：租金（rent）一词，在经济学的早期阶段中，是指由于某些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因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地增加而产生的超额收入，例如由土地所有权垄断或经营权垄断产生的地租，杰出的艺术家由于天赋才能的稀缺性而得到的高额收入等。现代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发现，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口配额规定、生产许可证发放、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从业人员的人数限制等，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也能形成超额收入，所以“租金”一词的外延扩大了。在现代经济学的寻租理论中，租金仍然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产生的差价收入，但是这里的供给弹性不足，已经不是因为某种生产要素的自然性质所致，而

①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4页。

② 杨继亮：《腐败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第201页。

③ 杨春洗：《腐败治理理论衡》，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版，第10页。

④ 祝福恩、于丽：“腐败现象的理性思考”，《蒲峪学刊》，1997年第3期，第28页。

是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的人为因素。既然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就必然会有人进行寻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寻租活动的特点，是利用各种手段，如游说疏通、找后台、送贿赂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进行“权钱交易”，取得高额收入。^①

这种论点的本质特征是用纯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腐败现象。它认为，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确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往往会广泛出现寻求权力以营私的“寻租”活动。

第三种论点是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即以是否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作为腐败行为的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公务人员为得到金钱或其它私有报酬而采取有利于提供报酬者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时，腐败就产生了。这种观点并没有强调腐败的违法性，而是把“谋取私利，损害公益”作为腐败的唯一标准，因而是目前国内最广义的腐败定义论点，例如陈卫东^②、杨宏山^③、黄百炼^④关于腐败概念的定义。这种论点的本质特征是紧紧抓住腐败的利己性和权力异化性，并把它作为衡量腐败行为的唯一标准。它与第一种观点的根本区别就是它没有强调腐败的违法性，而且认为腐败行为有可能发生在法律尚未规定到的领域里。

2. 关于体制转型的概念

相对于腐败概念的多样性而言，体制转型的概念则显得比较统一。只是在用词上，国外学者多把“体制”与“制度”两个词换用，而国内学者则认为这二者是有很区别的，他们认为转型的只是体制，而非制度。

德国的柯武刚和史漫飞在其《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里写道，“‘制度’和‘规则’这两个词在本书中可互换使用。”^⑤在谈到制度转型时他们写到：“制度转型意味着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或转变为另一种国家和政体。眼下，该词指这样一种制度变革，即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控制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产资源为主。”^⑥在两位德国作者眼中，体制转型与制度转型的含义是一样的，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型，更确切地说，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趋向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型。

中国学者们普遍认为“体制”与“制度”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例如，关海庭认为：“体制是指为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制度规则，它包括法律、规章、道德和习惯。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在使用体制和制度这两个概念时，一般是不加以区分的。而我们则赋予这两个概念以不同的涵义，即制度是指根本性的规则，而体制则是指各种机构划分的具体性规则。……体制转型有其特定涵义，特指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集权向分权、

① 《经济社会体制编辑部》编：《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序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② 陈卫东主编：《腐败控制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③ 杨宏山：“试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及其对策”，《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27页。

④ 黄百炼著：《遏止腐败——民主监督的程序与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⑤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页。

⑥ 同上，第505页。

从计划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① 在关海庭的定义里，体制转型不仅包括经济体制的转型，还包括政治体制转型等其它形式。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该决议将“制度”与“体制”作了理论上的区分，把决定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称为“制度”，而把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统称为“体制”，并明确指出，当时全面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将要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在理论上提供了对二者进行区别的标准。

由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着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许多学者在谈到体制转型时，都自然地把它与经济体制转型相等同；近年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谈论政治体制转型的文献也渐渐多了起来。但是，有些社会学者认为，社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整体，即便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也无法囊括体制转型的全部含义，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社会转型这个提法。例如，李培林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② 与这个定义相类似的观点还有杨桂华^③、王继宣^④、刁乃侠^⑤等人对体制转型的定义观点。

3. 本文对腐败和体制转型的定义

综合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腐败所作的不同界定，本文作者认为，腐败行为必须满足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条件：公共权力的异化和获取一定形式的私人收益。公共权力的异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指的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做出了违背设立公共权力初衷、目的和原则的错误行为；如果权力背离了它的公共性质，成了执掌者的私有物，服务于执掌者的私利，我们就说公共权力发生了异化。获取一定形式的私人收益，并不单纯指的是获取经济方面的利益。除了主要是经济上的收益以外，它可以是政治上的，例如官员之间作为政治交易而互相安插政治亲信；它也可以是掌权者某种欲望的满足，例如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官员们为了贪图女色而滥用权力的案例等。

腐败的上述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一项行为只涉及公共权力的异化而没有获取特定形式的私人收益，它就应该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专权或渎职行为，例如封建时代暴君的独断专权行为；如果一项行为只涉及获取一定形式的私人收益而无公共权力的介入，它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行为，这时要分情况对待，如果是在法律允许的竞争范围内获取的私利，则是正当和无可厚非的，例如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制而发家致富，如果是在法律禁止的范围内获取的私利，则是不正当和需要打击的，例如各种没有权力涉入的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只要明确了这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就能够剥离和透过各种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表面形式，迅速识

① 关海庭：“论当代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7卷，第71页。

②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战略及企业组织创新”，载于袁方等著：《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③ 杨桂华：《转型社会控制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222页。

④ 王继宣：“关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37卷，第13页。

⑤ 刁乃侠：“略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体制转型期”，《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0.4，第30页。

别和提炼出腐败行为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认为腐败行为可以发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外，因为社会的不断发展决定了立法的相对滞后性。例如，在一个法律体系还不是十分健全的国家里，可能一项本质上包含着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收益的行为还并未被法律所禁止，但它仍应先被定性为腐败行为，而后再要求法律条文的补充和完善。只有不拘泥于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而先界定某些本质上是腐败的行为，才能及时发现法律法规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促进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综上，本文对腐败概念的定义是：由于公共权力异化而获取一定形式私人收益的行为。

关于体制转型的概念，本文主张用一种综合、全面、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文化意识，而且它们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体制只是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体制转型并不是动摇和改变社会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基本制度各种具体性规则的转换和变迁。由于一个国家的各种体制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所以体制的转型必然是一个综合、全面、整体的动态过程，并不存在只涉及某个领域的、而不涉及其它领域的孤立转型。综上，本文对体制转型概念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具体性规则和表现形式所发生的综合、全面、整体的转换和变迁。

二、中国、韩国、俄罗斯体制转型时期腐败现象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中国、韩国和俄罗斯在体制转型时期的腐败滋长现象作为实证分析的案例，以揭示出体制转型时期腐败的新类型、新特点以及腐败程度的走向。对中国案例的分析是本文的重点，选择韩国和俄罗斯，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转型前的情况以及转型的过程与中国有一些颇为类似的地方，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参考价值。

（一）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的腐败滋长现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就开启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门，只是由于此后体制转型过程几经挫折和反复，所以人们通常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进入全面而深刻的体制转型过程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初，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中国更是进入了快速体制转型的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无疑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转型形式，它引起了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体制转型的稳步进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方位转型，使中国在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化科教事业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腐败滋长就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和棘手的问题。

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的腐败滋长与转型前相比较，既有继承性，又有变化性。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腐败形式，例如行贿、受贿、挪用公款、裙带关系等形式仍在继续蔓延，但是，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也明显地呈现出一些新的、在转型以前没有的类型和特点，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归纳出这些新类型和特点，并解释它们产生的主要原因。

1. 体制转型时期的腐败行为无论在数量和层级上都大大超过体制转型之前的情况，而且还呈不断上升趋势。自从1978年全面转型以来的20多年中，因牵涉腐败犯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达到235万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公职人员超过40万人。腐败案件保持增长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腐败案件总体数量的增长速度惊人。根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的结果显示，全国各级检察机关1979—1982年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225件，1983—1987年间则增至15.5万件，1988—1992年间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间更增至387352件（而这时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均已提高），在18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② 大案要案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违法违纪金额在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特大案件不断增加。这里所谓的“大型腐败案件”是就涉案的金额数而言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型腐败案件”指的是涉及1万元以上的腐败案件，但是到了90年代这个标准已经上升到50万元乃至100万元以上了。根据官方数据统计，1993年1—9月间，各省检察机关立案调查的涉及金额1万元以上的大型腐败案件占有所有被调查案件的59.7%，在这些大型腐败案件中，涉及金额超过50万元和100万元的案件分别比1992年同期增长了2倍和3倍；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的腐败大案总数在1983—1987年为30651件，1988—1992年间升至49122件，增加了60%，1993—1997年则随

升至 168904 件，增加了 2.4 倍，其中违法违纪金额在百万元、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特大案件有增无减，例如，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涉及金额竟高达 530 亿元人民币，创下了建国以来腐败案件金额的最高记录。^③ 涉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比例不断增大。据统计，1983—1987 年间因涉嫌腐败案件而受到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总数为 1500 余人，1988—1992 年间为 4623 人，1993—1997 年 10 月更高达 9769 人。另外，从 1993 年到 1997 年 3 月间有 2 万余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600 名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因涉嫌腐败案件而受到纪检监察机关的查处，1988 年一年就有 5357 名县处级领导干部、410 名地厅级干部、12 名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受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中国体制转型最根本的形式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目的是利用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鼓励人们通过竞争谋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唯利性必然也会在体制转型期间得到充分体现。如果在转型过程中，指导市场运行的各项公平、公正的规则和机制无法有效地在全社会得以确立，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并大量诱发腐败现象。中国 20 多年来市场取向的改革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破除，政企还没有完全分开，政府仍握有大量资源及产销要素的配置权。尽管目前市场调节的部分有所上升，计划调节的部分有所下降，但实际上计划调节退出的部分，市场调节并没有马上补入并实行有效调节，仍是计划手段在调节，政企仍搅在一起。市场调节的实行，使货币规律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使以往的“钱随物走”变为“物随钱走”的资源调拨方式。在体制转型时期，短缺的资源唯有通过权力才能批到，于是，市场上经济主体的资源竞争，就变成了权力的竞争，对资源的需求就变为对权力的需求，而且需求越大，就越为权力资本化提供条件，从而建立权与钱交换的“便捷”通道。拥有权力的人，在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刺激下，便滥用权力以谋取私利；无权的人为搞到紧缺物资，用钱、物、色等与权力进行交换，并通过交换过来的权力达到自己的私有目的，腐败现象就会不断蔓延、滋长。

2. 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们利用体制转型产生的大量“差价”空间，肆无忌惮地滥用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谋取暴利，中饱私囊。人们俗称这种现象为“官倒”。转型期的“倒爷”有倒物资的，例如钢材、水泥、汽车、化肥等紧缺商品；有倒批件的，就是将计划管理的批件当作有价证券倒手以牟利；后来这种官倒又发展为“倒业”，即利用行业管理的特殊化，把行政管理权变成一种谋利的工具，到处“设关建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就乱办事。这些“倒爷”们经常挂的是“无资金、无办公场所、无设备、无人员”的皮包公司，通过转手倒买倒卖，牟取暴利。一些政府官员看到转型期间计划和市场价格的巨大差别、看到计划物资和紧缺商品供求矛盾所产生的丰厚利润，就纷纷以搞活经济为名，经商办企业，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和非法倒买倒卖的活动。这种党政机关经商热，在 1985 年形成第一次高潮，经过一年半的治理略有缩减；1987 年到 1988 年 6 月，又形成第二次经商高潮。不少政府官员和领导干部摇身一变成为各类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到处批条子、拉关系、要东西，再转手倒卖，使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入个人的腰包，并造成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国家工商局在这一段时间打击和处理了 317 起投机倒把的大案要案，其中就有 58 起是涉及物资部门的官倒公司。

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统一管理市场，统一调拨资源，统一分配劳动成果，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计划与市场的“差价”；在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处于共存和竞争状态，因此必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价格、税收、利率和外贸等方面的所谓“双轨制”。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完全确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大量由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所引起的“差价”空间就产生了，从而为那些私欲熏心的掌权者进行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转型的不彻底性和不完全性，官商不分、政企不分现象很难杜绝，各种官方的审批环节和程序都在发挥作用，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制”使拥有各种平价资源控制权和支配权的官员们，可以用权力介入市场，实现权力的资本化和商品化。既然行政权力可以创造寻租的条件，必然就有掌权者热衷于在体制转型激烈进行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不断地进行“设租”活动，以实现寻租的可能性。这样，由体制转型到寻租可能性的增加，再到设租行为的大肆猖獗，就构成了转型期间腐败滋长的恶果。

3. 体制转型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下的腐败现象相当突出。中国体制转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中央政府实施这个战略转变是要鼓励某些人和某些地区先富起来，并带动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但是从地方政府看来，只要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就是成功的作法，就有可能得到奖励和提拔。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对那些通过非法手段迅速暴富但同时也能在短期内刺激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人，经常是采取一种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这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同时无视法律法规约束的地方政府意识，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滋长。在这种受到歪曲的转型意识的误导下，那些利用体制转型缺陷非法暴富的“能人”们必然不断向各级政府官员行贿以争取更多的政府保护，而地方政府也往往以经济上的“成就”来为这些非法暴富的行为提供袒护的借口。这种现象无疑会对腐败的大肆滋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在查获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中，以赖昌星为首的犯罪集团疯狂走私各种紧缺的原材料，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厦门经济的发展，再加上赖昌星不惜以各种手腕腐蚀、贿赂、拉拢各个层次的官员和干部，所以在“远华集团”走私最猖獗的时候，赖昌星不但没有任何事，而且还成为厦门的“风云人物”，享受到各级官员的“优惠”和“关照”。

在体制转型前，财政收支和分配实行的是“大锅饭”的政策，即由中央统一决定地方财政的收支和分配。这对各个地区是相对平等的，因此地方的利益意识并不强。体制转型的特点就是要用“分灶吃饭”的地区包干制来代替“大锅饭”分配的作法，以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是在这种体制转型刚启动的时期，地方政府往往容易陷入本位主义的意识“泥潭”，片面地认为本地区经济越发展，就会处于越有利的地位；而本地区经济越落后则处于越被动的地位，这就大大增强了地区的利益主体意识。一些地区为了局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整体大局，甚至违背全局利益和中央政策来刺激本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作法，从而使这种转型条件引起的地方主义保护下的腐败滋长愈演愈烈。例如，有些地区为了局部的利益，保护甚至纵容本地区的违法犯罪行为（诸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走私贩私、经营色情业、对工程的质量偷工减料等等），并从中谋取非法报酬。众所周知，腐败行为发生的频率同它被制裁的机率呈负相关关系，即当从事腐败活动获利很大而受到制裁的

机会很小时，腐败现象就会愈演愈烈。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当政府官员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大得多时，他们就有可能“铤而走险”，而当从事腐败活动的成本足够大时，他们就会“及时缩手”。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旧体制的受益者总是会想方设法地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体制转型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是腐败滋长的一大诱因，因为它大大减少了腐败行为受到制裁的机会成本。在转型过程中，某些地区或部门的领导干部采取种种手段阻挠腐败案件的查处工作，保护乃至提拔重用因涉足腐败而被查处的干部，造成了“腐败无罪”、“搞腐败有功”的怪现象，无疑会大大助长腐败日渐嚣张的势头。

4. 以单位为主体的集体腐败和“一把手”腐败的现象呈多发态势。近些年来，在查处的官员腐败案件中，涉及单位各级领导、普通干部和工作人员的“集体犯罪”呈上升趋势。在体制转型时期，有的单位领导为了笼络人心、推卸责任，在腐败时采取“有福同享、利益均沾”的手法，诱导甚至威逼单位其他人一起大肆瓜分腐败的所得利益（当然领导由于“责任”重大应该享受大头的所得利益），这样即使有朝“东窗事发”，这些领导也可以拿出“集体负责”的挡箭牌，设法逃脱罪责；有些行贿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花费重金，对单位中的所有“利害关系者”逐个买通，以求万无一失。这样，在查处腐败案件时就可能抓出一个带出一群人，破了一个案件又带出一团案件。有的腐败案件一查下去，涉案人数多达几十、甚至上百人。例如，1998年查处的广东湛江走私大案中，受党纪国法处理的有331人，其中公职人员259人，仅湛江海关一个单位的涉案人员就达到132人，超过本单位在职人数的19%；2000年查处的三峡机场受贿案，涉及机场总经理，两名副总经理，四名处长以及20余名中层干部；2000年9月开庭审理的号称“中国第一大案”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中，共有156名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依法处理。

集体腐败的猖獗主要是由“一把手”的“带头”腐败引起的，而“一把手”的腐败现象主要是由体制转型条件下的监控机制不力所导致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公共权力的本质是对人民普遍需要的、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事物或资源进行统一分配的权力，这种分配带有一种人民必须服从的强制性。因此，掌权者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就处在别人有求于己的地位上，只有保持对他们的监督和控制才能保证公共权力不至于异化和变质。当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失去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的时候，其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活动便可以畅通无阻，而在腐败行为发生后又不用担心受到法律制裁。这样，腐败的滋长、泛滥就是不可避免的。

我国体制转型期间监控机制不力的缺陷主要体现为监督太泛而控制不力。监督机制和控制机制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监督是前提，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控制；控制是保证，没有强有力的控制，监督也会因为软弱无力而失去效用。以往我们对监控机制的认识，往往只强调监督的功能，而相对忽视控制的功能，因而经常导致监控不力的后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监督机制恢复较快，各种形式的监督不可谓不多，例如政党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但是，任何形式的监督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证国家法律 and 政策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执行。如果一项监督形式的确立并不能使法律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得以控制，并且防范类似的偏差再度发生，那么这种监督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好看的“空壳子”。体

制转型时期，监控者的地位缺乏独立性，甚至受制于被监控者，使监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反腐败的努力大受影响。各级监控主体在人员任免、资源供给、重大决策的制定等方面都受到同级政府部门的干预和制肘，无法完全独立地办理涉及政府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的腐败案件，就会使打击腐败的范围和力度都受到限制，并间接导致“一把手”腐败现象和集体腐败现象的泛滥。频频曝光的腐败案例表明，如果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不能有效建立和健全对公共权力的监控机制，掌权者走向腐败只是迟早的事。

此外，体制转型加剧产生的大量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漏洞也是集体腐败和“一把手”腐败大肆滋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一个政府而言，制定转型时期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因为它没有任何以往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必须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的制定工作往往会滞后于体制转型的步伐而需要及时和不断的修改、补充，这也加大了法律实施的难度。传统体制下直接运用行政管理权去干预经济实体的行为显然已经被认为是错误和无效的，但是要学会熟练自如地运用间接的宏观调控的管理方法也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完成以前，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所客观存在的各种弊端和漏洞就会给腐败滋长提供可乘之机。在体制转型时期，法律法规的漏洞主要体现为：①立法的步子跟不上体制转型的趋势，相当多的领域还没有法律的约束。由于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多用行政的手段，而一度忽视法制建设，行政命令的权威往往大于法律的影响，因而许多官员法制观念极为薄弱，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取代法律手段；②就算有法律约束的领域，法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异化的权力所扭曲变形，对许多违法乱纪事件的处理并不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是一拖再拖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导致肇事责任人逍遥法外，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大肆蔓延，原因固然很多，但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立法和执法上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呼吁多年的《反腐败法》、《监督法》、《政务公开法》等法律形式均未颁布，这就使执法人员对一些复杂的腐败案件进行定性时感到为难和困惑，也为腐败分子巧钻法律空子打开方便之门；即便是对那些已被现行法律和法规定性为腐败行为的处理过程中，有的案件查处时间过长，打击不及时，给腐败分子设法逃逸提供了条件；有的案件的结论是以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律的惩罚，显示出极大的随意性；有的案件处理得虎头蛇尾，“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造成相当数量的“黑数”存在；等等。所有这些立法和执法中的问题都极大地助长了体制转型时期腐败滋长的歪风邪气。

5. 一些体制转型过程中浮现出来的腐败的新形式迅速蔓延，并且日渐猖獗，而且腐败犯罪的手法越来越高明和隐蔽。例如，走私腐败就是体制转型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一种腐败的新形式，走私的对象经历了一个三步跳的过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诸如彩电、自行车之类的消费性产品，到 80 年代中后期的诸如钢铁、石油之类的生产性产品，再到 90 年代的诸如股票、信贷、房地产之类的各种生产性要素。近年来，国内走私活动十分猖獗，范围广、物种多、数额大。其中广东、福建、广西等是全国走私的重灾区，许多案件都是海关、公安部门与走私集团内外勾结，甚至提供“一条龙”服务。近年来查获的广东湛江走私案和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其涉案金额和卷入的政府官员数量之多、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破坏效果之大，

在我国建国以来均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可以从表一中看出中国体制转型以来走私腐败的纵向发展轨迹。

表一：海关打击走私数据表（节选）

年 份	查获走私案件（件）	查获走私案值（亿元）	平均每案件案值（万元）
1979	13442	0.07	0.05
1980	36616	0.51	0.14
1989	11960	5.58	4.67
1990	11676	6.01	5.15
1999	1369	100	730.5
2000	1142	86.1	753.9

资料出处：胡鞍钢：《中国 90 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国际经济评论》，2001.5—6，第 16 页。

表一的走私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查获的走私案件数量较多，但平均每案件的案值却很少；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虽然查获的走私案件数下降了（这包括犯罪手段提高的因素——作者注），但是查获的走私案值和平均每案件案值的增长速度简直让人瞠目结舌。这说明，中国体制转型时期走私腐败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了。

体制转型期间，反腐败机构自身的某些缺陷也会导致腐败的滋长、蔓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仅腐败的外在手段在不断翻新，而且腐败的内在特点也出现了一些转型以前没有的发展趋势，例如逐渐向专业化、高科技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近年来中国出现的许多经济领域的腐败犯罪现象已经涉及到很专业、很细微的领域，诸如股票市场的投机倒把和跨国资本流动等情况，其手段也是综合运用各种高级的现代技术条件，诸如网络和先进的电子设备。这就对反腐败机构的运转处理能力及其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体制未能完全理顺，我国的反腐败机构在资金供给、技术设备、人员培训等方面还跟不上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步伐。这就使反腐败的努力由于“自身条件不足”而大打折扣，也使腐败行为由于被抓获的机率过低而大肆滋长、蔓延。

6. 体制转型进行得越充分、越深入的地方，一般也是腐败现象最猖獗、最泛滥的地方。体制转型和改革的“前沿阵地”往往成为腐败现象的重灾区，随后再从这些重灾区扩散到其他更多的地区和领域。例如，走私贩私、黑市交易、偷漏税、商业瞒骗、公贿等腐败形式大都先在东南沿海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泛滥起来，随后向内陆地区和边远地区蔓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证

券、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先后成为“官商”、“官倒”等腐败现象盛行的主要领域。9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工程建设领域、粮食购销储存领域、政府采购领域、国有企业经营领域、各种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管和使用等领域又成为腐败的新的重灾区。这些无疑与新旧体制并存和转换时期腐败机会的增多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腐败滋长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往往会扭曲正在实施中的各项改革措施，败坏体制改革的声誉，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努力。腐败现象的严重滋长对现代化建设大业造成了严重危害，各种腐败行为和相关的经济犯罪的盛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量惊人而且呈直线上升趋势。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通过查办经济腐败案件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而言，1983—1987年间为16.3亿元，1988—1992年间为25.8亿元，1993—1997年间则高达229亿元，而同期纪检监察机关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也高达159亿元。根据我国学者胡鞍钢的估算，1995—1998年间我国因各种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950—12670亿元，占同期GDP的13.3%—16.9%。^①

（二）韩国体制转型时期的腐败滋长现象

韩国的体制转型可以概括为经济转型以及政治转型。韩国的经济转型，是以1961年朴正熙政变上台后的经济改革为标志。20世纪60年代初的韩国仍然非常贫穷落后，1961年朴正熙政变上台后，从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出发，果断地提出了“经济第一、增长第一、出口第一”的发展战略，并亲自着手制定和推行了四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从而拉开了韩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促进了韩国经济的起飞，使韩国迅速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韩国的政治转型，是以1987年卢泰愚发表历史性的“6·29”民主化宣言和国会12月12日通过新宪法为标志。韩国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一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即通过权威政府的强制政策或诱导政策来实现经济发展。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后，韩国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进程就一直在进行，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妥协，终于由卢泰愚在1987年6月29日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并促成国会于12月12日通过了新宪法，从而标志着韩国从权威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韩国的腐败现象由来已久，但在体制转型时期，腐败现象突出地表现为顽固的金钱政治，即某些企业或团体为了私有利益，打着“政治捐款”和“政治资金”的名义，大肆向政治家行贿；政治家之间也为了某些肮脏的政治交易而互相行贿等，这种情况即便在最高领导层中也不例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前总统卢泰愚和全斗焕在执政期间大搞秘密政治资金的腐败丑闻。根据披露，卢泰愚执政5年期间非法聚敛和侵吞5000亿韩元（约6.5亿美元）的秘密政治捐款；当时最大的在野党领袖金大中披露，卢泰愚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给他20亿韩元的选举资金，并举报说卢泰愚当时也给过金泳三比他自己多数倍的选举资金。民主党议员朴启东还指出，自由民主联合总裁金钟泌也从卢泰愚那里收取了100亿韩元的政治资金。^②这

^① 胡鞍钢：《中国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国际经济评论》，2001.5—6，第18页。

^② 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